

主题：第三届中欧社会论坛“移民子女教育与社会融合”分论坛

时间：2010年7月10日（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7：45）

地址：北京天安瑞嘉酒店七层会议室

内容：

主持人：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会议现在开始，耽误了一点时间。我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我叫刘洲鸿，很高兴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可能很多朋友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中欧论坛，这个中欧论坛是2005年开始的，是中国和欧洲民间的一个对话，2005年举行了第一届，2007年第二届，本来2009年应该是第三届，2005年第一届是在中国，2007年是在欧洲，2009年本来应该是在中国，后来因为禽流感推到了今年。

中欧论坛目的，就是推动中国和欧洲民间之间的对话，有方方面面的主题，包括公民社会，还有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今年的第三届论坛有60多个分论坛。移民教育在欧洲和中国，都是一个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像欧洲随着欧洲共同体的融合的趋势，整个经济上的融合，还有社会的融合，下一步接下来是法律方面的融合。他们国家之间的流动，这个移民不仅是国内的流动，还包括欧洲大陆的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所以他们面临着移民方面的问题。

中国也一样，中国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他们的子女，有的也跟着进城，这样也是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农民工本身他的权益，他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的问题。还有他们子女的教育的问题，包括如何融入这个城市社会的问题，也都是中国当下的一个问题，而且也会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一个重大问题。

可能欧洲关于移民方面应该比中国更早就面临这些问题了，欧洲在这方面应该也有一些他们走过的路，他们的一些经验教训，我想对中国如何做好移民教育和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会有一些启发。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也许欧洲方面也会有他们的见解，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论坛加强双方在移民教育和融合方面的一些交流沟通和合作，看能不能形成一些共同的方案，这是我们今天会议的目的。

我就先讲这些，祝大家今天会议讨论愉快！我们请欧方的组长致辞！

Celine Dumont: 我也很荣幸能够在这里讲话，尽管我们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移民子女的教育和社会融入问题。首先我想要给大家介绍的是Isabe Eiriz女士是来自瑞士的，黄黑妮是来自意大利的，Nadhalié Baschet是来自法国的，Maria Tsabe这位女士是来自西班牙，我叫Celine Dumont，我也是来自法国，代表法国。尽管我们不是来自欧洲的所有国家，但是我们有不同的经验，在关于移民子女的教育和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都作出了很多的研究。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对主题，移民子女的教育和社会融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分论坛是关于，移民父母他们的权益以及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这两个论坛是紧密相连的。

我们这个论坛主要是关于儿童的，为什么我们这个论坛主要是关于儿童的，现在我希望来去讲述一下，为什么这个论坛是专门对于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社会融合问题的。

首先是因为移民子女，首先他们最基本的一个身份，因为他们是孩子，是儿童。不管是什么人的孩子，他们终归来说是孩子，所有的孩子都有权益共同沐浴在同样一个太阳下。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到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是到另外一个地区，有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的，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的，比如说在法国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年龄一般是低于18岁，离开祖国，有的时候是为避免战争，避免暴毙，有的时候因为饥饿，所以我们应该对他们的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还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因为他们的家长，他们的父母，迫不得已离开他们的家乡去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地区，这个情况下，对于这些儿童，他们的教育问题，他们的权益，他们需要获得的一些保障，以及他们怎样去更好地融入到这个社会当中去，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应该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义务，来去教育移民子女，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喜悦的心情给他们支持，教他们怎样学会语言相处，学会在同样一个蓝天下生活。其实我们不管是地理位置的不一样，语言文化都不同，但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面临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孩子的教育和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因为孩子们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就像刚刚这位先生所提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流动性越来越强，每一个国家目前都在面临这

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学校、成年人、还是社会，我们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对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和他们的社会融合问题负起责任。

现在，其实我们面临是同样的挑战，我们在同样一条道路上，今天我相信我们之间的这一种会谈，还有交流，能够让我们更好地发现在这个前进道路上的一些问题，能够更好地找出一个解决之道。其实，在对于移民儿童的教育问题上，有这样一些难点，比如说他们怎么样更好地接受所接待地区的教育怎样融合，他们在这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手里都有议程，接下来就是由中欧双方的代表，分别介绍一下，中国移民子女教育和社会融合这个背景，还有大家的现状，中方就请周艾丽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介绍得不太对，一会儿这么多专家学者也可以提出来。

周艾丽：我现在会对中国移民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想让欧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的介绍不是特别的全面，大家可以补充。

其实农民工子女就是中国的移民子女教育问题，是在中国转型社会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因为在五十年代之前，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控制着这个人口的流动，大家在5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的发展，在五十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流动量逐渐增大，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里打工。

农民工的流动性，现在表现出三个特征，首先是农民工的规模非常大，而且增速非常惊人，有一个预测表明，到2030年可能在中国的农民工总数量会达到3.5亿，第二个问题是说，在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在每一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在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比如说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已经成为了当地城市的大多数。第三个问题，在中国的农民工迁徙呈现出一个家庭式迁移的现象，农民工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到城里面去。

对于农民工的子女来说，他们现在在中国的一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现在的一个统计是，在2006年一个官方的数据显示，当前有2000万的流动儿童在中国，可能到2030年的时候会达到5000万。

其实流动儿童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分论坛的主题，现在流动儿童面临的教育问题，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他们的失学情况比较严重，第二个他们中途辍学率以及超龄现象很严重，第三个问题是流动儿童接受到教育的质量非常令人担忧。

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组织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如果得不到特别好的解决，不仅对他们自身和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来说，也会造成非常大的障碍。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在存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讲，政府的政策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开明，政府提出一个政策是两为主要的政策，就是让农民工的子女更多让流入地的公办学校就读。虽然政策上是这样一个规定，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这个政策过于原则化，而且非常难操作，在中国各个地区这个政策的执行力度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地区政策基本上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在这样一个政策失灵的现象中，我们看到的根本性问题是，首先是一个体制性的冲突，因为在中国的户籍制度和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制约了这些政策的执行；第二个是政策性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政府会害怕这个问题解决得越好，流入的农民工子女就会越多，对城市造成更大的压力；第三个是利益性的冲突，当学生流入到公办学校的时候，跟当地的学生会产生利益分配这样一个冲突，外来学生对教育资源的分享，会和原住居民有一些利益冲突。

还有其他三个根本性的原因，第四个对农民工的子女教育投入是存在很大风险，因为他们流动性很大，教育的硬件投入非常难规划，他们可能今年在，明年就走了；第五个财政压力巨大，公立学校吸纳农民工子女承担很大的成本；第六个问题在中国教育资源的不足，如果说按照公立学校的标准去收所有农民工子女，中国的城市基本上每个城市到现在来讲，是承受不了的。

政策失灵之后，城市的公立学校是没有能力接受所有的移民子女，他就会设一些门槛去阻止移民子女的大量流入，这些门槛包括了费用，就是学费的门槛，第二个是身份的门槛，就是移民子女要到这个学校就读必须是要有一些，证件才可以。第三个是管理和制度的门槛，第四个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隔阂。

这些公立学校的门槛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对教育资源需求的不足，民办学校

为打工子弟专门设立的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应运而生了，这些学校在大部分的城市，这些学校解决移民子女教育问题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他们的教育质量非常令人担忧。

这么多的问题，已经直接导致了社会上的农民工子女一些行为的失范，现在在社会上有很多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他们都来自农村，但是他们在城市里面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教育的不公平，包括城市融入的难度，让他们很有可能产生犯罪。以上就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中国产生的一个原因和背景。

主持人：好，谢谢艾丽。可能我们中国的同行听起来觉得大家都知道，艾丽主要是给我们欧洲来的朋友梳理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请欧洲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在移民子女教育和社会融合方面目前的一些状况。

Isabe Eiriz：首先，感谢组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论坛，今天我将给大家讲一下，在欧洲移民子女的教育以及社会融合问题，这个问题的特征主要是哪些。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下特征，然后继续介绍，这一次我给大家讲的是我们来自欧洲五个同行，我们一起研究出来的，一起经过讨论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首先，在欧洲目前有两个现状，第一个现状就是她在黑板上写的，意思就是说目前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人口富裕的程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继续强调一下，欧洲不同国家之间这种富裕程度的差距是越来越大，刚才是一个前调。第二个特征，欧洲内部不同国家之间，这个词是冲突的意思，很多来自欧洲比较贫穷的困难的国家的一些人，他们为了躲避战争，躲避战乱，躲避饥饿，来到欧洲比较富裕的国家。因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个是国家之间人口产生的冲突，还有争端，导致了移民子女的教育，还有社会融入问题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法律方面的原因，从法律方面来讲，我们欧洲国家之间签订了一个日内瓦条约，这个条约里面就规定我们要保护，移民儿童的教育以及社会融入的问题，保护他们移民子女应该享有的权益。虽然说有这样一个法律和条约的存在，但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法律执行上，执行得很好，关于在战争之后，欧洲的一些

有战争冲突的一些国家的人，到了欧洲比较富裕的国家之后，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他们要不时的更新他们的护照或者是签证，还有一部分移民是根本就没有相关的一些手续，没有签证就直接非法的到了欧洲的一些国家。不是合法的进入到欧洲的一个国家之后，我们就没有权益去住房，找不到住的地方。他们这些非法移民，他们的状况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他们甚至不能去租一套房子，甚至有的时候，没有权利去养一只宠物，养一个动物，还有一个是他们在物质上面，他们的状况也令人担忧。因为，这些移民相比较于这个本国的民众而言，他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

还有，我将会给大家提到关于文化方面的产生的隔阂。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因为这些移民和本国的居民他们的文化，还有教育的背景，以及他们的人生观都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很难去真正的融入到接收国。又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老师的教育和家长对他们的教育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关于他们的心理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孩子们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离开了他们本土国家之后产生的问题。他们在自己的祖国里面有了战争之后，他们心里面会有一些创伤。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担忧的，当孩子们进入学校之后学习，就不能够很好的集中精力。在学校里面，可能移民的子女也会受到其他孩子的一些歧视。

翻译：我刚刚给他解释了一下，可以把一个信息先说完，因为这种翻译的模式，她说一句话我说一句话，这个信息可能有一个中断，我给她解释，一个意思出来了之后，我一起翻译，她说这是她的工作方法。

Isabe Eiriz：移民家庭的子女还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般在欧洲，其实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他们是要花很大的精力，但是移民的父母，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条件，他们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照看小孩，来去关注他们的教育。如果这个移民父母他们不会说接收国的语言，他们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这样子对于孩子的教育，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在欧洲我们会有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会非常非常尊重学校，非常看重学校的教育，这个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家长都会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说学校会给我孩子最好的东西。所以当有一个家长把他的孩子送到学校的时候，家长会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孩子教育的投资。在欧洲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教员

老师们的培训问题。有的时候，老师教员他们对于这种跨文化上的认识，他们有的时候对于移民子女的一种偏见，这些种种的障碍都会对移民子女的教育构成问题。

现在我将不会长篇大论给大家说欧洲教育资源的问题等等，但是我想提出来的一点，即使当我们关注一个问题的时候，不仅仅应该关注这个问题的本身，应该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相关联的因素，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接下来，我们有很多的嘉宾参会者，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自己来自什么机构，然后关注什么问题，要不要翻译呢？都需要翻译，时间很短，我看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大概有20个人左右，大家尽量控制在三分钟以内。

Celine Dumont：大家好！我的名字叫Celine Dumont，我在巴黎工作，我在研究关于留守儿童的教育以及社会融合问题，已经有十年时间了，在这10年之前我在大学里面做研究员，做过老师，研究的是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因为我曾经有过做老师的经验，所以我知道移民儿童他们的教育和社会融合的问题，有的时候移民儿童和他的家长一起过来见我的时候，这个孩子需要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因为他们的父母往往都不会说接收国的语言。就到此为止！

Maria Tsabel：我的名字叫伊莎贝拉（音）。我是在西班牙工作，我所工作的组织是西班牙反贫困组织，去帮助一些移民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关于我的工作帮助这些移民还有孩子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她刚刚有一个自我解释，她自己是西班牙人，会把法语和英语弄混。

在跨文化方面的交流和研究方面，也会有一些心得和体会。

郭林凤：我叫郭林凤，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的社会文化史，我是主要做文化多样性的研究、欧盟的文化政策，还有移民问题和社保问题。

我最近比较关注的，我刚写过一篇文章是讨论欧洲的“头巾 音”事件，这个事件关于到了移民地差异和移民融合问题，我8月份要去法国，会在法国待两年，我会继续关注移民问题，也希望和法国移民工作者建立联系。

方原：我是来自新农民学校的，我从事流动人口孩子的教育9年时间。今天到会的大多数都是专家级别，我的任务主要是听讲和学习。

翟东海：大家好，我是来自腾讯网教育频道的翟东海，腾讯首先是我们现在在国内比较知名的一家网络媒体，同时腾讯作为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家优秀的企业，它有自己的腾讯公益基金会，作为媒体，它在不断的做公益，特别是我们教育频道，在不断的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作为一家有责任感的企业，腾讯公益基金会也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公益活动方面，也有过一些参与跟资助，特别是像去年也跟我们南都公益基金会以及二十一世纪研究院有一些共建的合作项目，也是针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

针对我本人，首先我以一个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这样一个身份，参与这样一个活动，我希望把我们这一次论坛的一些比较好的观点和声音放大传播出去，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通过中欧双方专家互动交流的成果，或者是一些问题，带回我们腾讯公益基金会的同事，希望他们有针对性的做更多更好的公益项目。

周皓：我叫周皓，来自于北大社会学系的。原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我原先博士论文做的人口迁移，从人口迁移理论方面到了现实的人口迁移很多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2000年开始我就开始关注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大概的背景，从2006年我开始自己主持一个项目，就是有关于流动儿童的跟踪调查。

这个调查做了3年了，它的主题最关键是从原来的教育比较或者学院发展转换到了儿童发展，也就是包括儿童的心理状况，受教育的状况，以及他的社会融合。我们在调查当中，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调查儿童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的，同时我们这个调查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家长跟社会的融合，家长的背景跟家长的社会融合都包括在内。

事实上我们认为儿童的社会融合最根本的，还是来自于他父母亲的教育方法，可能比较多。不过，最近没怎么做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周艾丽：大家好我叫周艾丽，首先我是在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的，这一次

论坛的主办方，做温州学校和银川学校的承办方，现在我在南都公益基金会负责一些项目，其实我小时候大概5、6岁的时候，我也是在北京的流动儿童，我当时因为父母给的条件比较好，跟现在流动儿童已经不太一样，我是去年刚关注这个领域的，这一次来负责这个论坛，也是第一次举办这种中欧对话，希望大家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满意的，都告诉我，我会努力改进。

Nadhalié Baschet: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Nadhalié Baschet，我有两个职业，第一个职业我是在巴黎的一所学校里面做老师教法语，主要是日本学校教授法语的老师，给他们培训法语课程。第二个我是和Celine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工作，帮助移民儿童更好融合社会，我在教移民小孩的家长教他们法语，因为我看到很多移民的家长在法国待了很多年，但是不会说法语。我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责任，我会组织一些晚会或者是聚餐，让一些本土的法国人和一些移民，给他们提供一个相互认识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她所有这些工作的经验，其实都是在实地，实实在在的一些活动中得到的。

张玉洁: 很高兴认识大家！我是来自打工者协会，是由一个美国人在2006年在北京成立的，我们的机构希望通过在农民工集聚的地方建立社区中心，为打工子弟开展一些社会和教育类的项目，能够帮助到他们，我们愿景就是为每一个打工子弟，提供一个未来和一片希望。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项目，就是服务对象，第一个是打工子弟，包括从周一到周五的一些辅导作业，一些活动课程，还有周六在我们社区中心，或者是合作的打工子弟学校开展一些，比如说手工、游戏等等这样的课程。

另外，在寒暑假会有东夏令营，针对家长的有家庭工作坊，有一些社区融合的活动，健康教育，跟打工子弟接触很紧密的打工子弟孩子的老师，对于十几岁的打工青少年有一个技能培训，为期四个月，所有的项目都是免费的。我们这些所有的项目都是依靠自愿者来进行的，每年会有超过一千多名志愿者参加到我们的项目中来，我们社区中心的模式探索和实践，我们希望它能够在中国得到推行，在中国就会有一个潜力，我们希望这个网络，农民工和打工子弟都会在一个权益很好的社区中生活和学习我们的希望，我这边有一些我们机构介绍的小册子，有

感兴趣的可以来看一下，谢谢！

赵虎：大家好，我叫赵虎。我是普工中学的社工，普工中学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是一个非营利的为打工子弟提供中学教育这样一个学校。我现在在普工中学主要是做一些成长课程，类似提供一些让打工子弟融入社会，北京城市生活这样一个课程。另外，因为也参与了郭氏基金会，香港郭氏基金会学生资助项目，主要也是负责这个项目，现在主要在做的有另外一个方面，因为咱们学校掌握的资源，还有学生家长的资源不对称，主要在做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信息的交流的工作，谢谢。

鹿永建：大家好，我叫鹿永建！我也有两份工作，我是新华社的一名评论员，同时也是北京关爱家庭中心的长期的志愿者，就像周艾丽所说的我们在中国5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农民工，我父母就是在60年代70年代出现的农民工之一，他在外打工的经历很多，我是8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移民到北京的，本来是一个江苏人。

就关爱家庭中心来讲，它是北京第一家，以保护家庭为意向的一家组织。由这个保护家庭，我们开始关注农民工的家庭，最近我们北京关爱家庭中心参与了一项与农民工家庭有很大关系的一个项目，就是山东省农民工家长委员会的建设，我很想说两句这个事，今天我们说到很多移民子女的教育，移民家庭他们权利的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零星的表达，没有一个组织的表达，这个声音是很微弱的。

家长委员会，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在英文里面是PDA，家长委员会是家长表达自己意愿的一个管道，家长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也是中国基层民主、基层社区组织建设发出声音的一个主要的管道，我在在山东聊城，有一个小学，差不多有一半是移民的家庭，但是家长委员会里面一个移民家庭的家长代表都没有，一个都没有，我给他们提出问题，山东的家长委员会，山东有两万所普通中小学，意味着至少有两万个，学校一级的家长委员会，这些家长委员会，包括北京的家长委员会，他们里面的移民家庭，移民子女，移民父母的比例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希望这个项目跟我们论坛做一个合作，我们这个项目有3年的时间，是整个山东省的中小学，涉及到两万所学校，上千个家庭。

韩嘉玲：大家好，我叫韩嘉玲。我是来自研究机构的一个研究员，同时也是一个在一线项目或者是在所有民间组织，参与这样子工作的一个实践者。我们大概是从1998年1999年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有关流动儿童的现象，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这个研究一部分，对这个流动人口儿童的现状、政策，通过研究进行一些政策的倡导，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从十几年来看，今天中国的流动儿童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十几年看来，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从政策方面。从实践面上，我们一直从1999年的时候从流动人口的社区，针对流动人口的家长和儿童，进行一些所谓的社区的服务。中国跟法国有一些东西是非常接近的，他的家长，流动儿童的家长，他们没有时间照看自己的子女，所以我们也社区中心提供了一些，譬如像课后的辅导，在周末、暑期的课后的活动，中国家长依然存在着子女教育的问题，我们也有一些家长讲座一些培训活动，这个是在流动人口社区，我们提供一些公共的服务。

在学校这个部分，也存在着跟法国有一些共同的现象，也存在着教员问题，我们不是跨文化的族群，我们是相同的流动，中国是存在着城乡的差异，老师对学生的认识跟偏见，因此我们也在跟很多学校合作，在学校里头对教师进行一些教师培训，我们的工作就是这几块。

熊亚洲：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友之家发展中心的熊亚洲，我以前是那儿的自愿者，现在是那儿的职员。北京工友之家是一家为打工者提供服务的民间机构，我们机构下属有好几个项目，有好几块内容，一个是艺术团，会经常去工地、工厂、打工者社区，为打工者提供一些文艺演出，我们在长安区办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们有一个流动儿童学校，就是关于打工子弟孩子的，北京将近有30多所。有一些合作，为小孩子提供一些绘画、摄影还有戏剧的一些小的兴趣小组，我们在长安区那边办了一个打工者发展历史博物馆，除此之外，我们每年会办两个艺术界，一个是新公民文化艺术节，一个是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到目前为止这两个艺术界办了两次，我们主要开展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刘文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公民之友，这个是在农民工领域建立一个公共的平台和统一战线，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上是面纱之后的，主流社会经常看不见的，它跟主流社会之间可以建立一个通道。

比如刚才周艾丽介绍的关于中国农民工子女的状况，我听了之后，我觉得至少我们现在面对欧洲的朋友介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缺乏一个，对于中国农民共子女教育现状，一个民间的，一个统一的认识和说法，我觉得我们在很多场合都没有这个东西，在3分钟之内你说中国农民教育子女问题说清楚，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小，我觉得刚才周艾丽说的那个东西，我知道，让一个外人来说的话，重点的东西没有说出来，我觉得我们今年想做一个项目，叫农民工子女教育。现在社会上很多企业都在说，但他不了解这个领域，你能不能最简单的时间告诉人家，这个领域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根源是什么，现状是什么，社会上可以做一些什么。

我觉得有一些对我们来讲是常识的东西，把它总结归纳一下，我觉得今天的会我觉得是否可以，中国的公益机构关注农民工子女做这样一件事，我觉得很有必要的。

我补充一句，我们中国现在有2000万的流动儿童，但是我们现在要告诉他们还有5800万的留守儿童，他们是被迫了留在家乡，与他到城里的父母是骨肉分离，长期的骨肉分离，这种情况，欧洲移民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关于背景，刚才说的这个，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背景，有2000万是移民过来的，有5800万是留守的。

于杨：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一下新公民，我们经常说的流动子女的问题，我是于杨。是来自新公民学校最底层的老师，也是跟流动儿童最直接的接触者，跟他们在一起体会他们的快乐与痛楚，跟他们之间产生的那种感情，也是对他们认识最为深刻的一类人。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在我这一层面上，对流动子女儿童一些感受和一些想法，谢谢！

贾海霞：大家好，我是来自“行之星新公民学校”的贾海霞。“行之星新公民学校”，这样一个农民工子女教育实践的一线领域，已经工作了九年，先后参与学校的创办，做过学校不同年级的语文老师，现在担任学校的管理者，做学校的校长。目前正在和我们新公民学校的团队，一起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办学模式，今天非常高兴能和我们这个领域的专家学习，让我们从更高的角度看待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谢谢大家！

刁文：大家好，我叫刁文。我来自百灵职校，我们是一所为贫困农民他们的子女16-22周岁，我们是给他提供全免费的职业教育的一所学校。

Isabe Eiriz：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Isabe Eiriz，我是西班牙的心理学家，在这之前，曾经在中美待过几年，主要是研究战争对于人心理上的影响，之后我去了瑞士，从1994年的时候开始，主要是研究的在关于移民方面怎样去保护移民的权益，在这个领域工作了将近15年，在更好地帮助移民融入到社会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让妇女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让妇女去上学，同时她们的孩子有专人看管，她们不需要有后顾之忧，除此之外，我的工作还有，比如说帮助那些在专制国家或者是受到水深火热的战争煎熬的难民，帮他们更好融入接收国的社会，除此之外，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培训教员，让他们消除对于移民孩子和移民家庭的歧视。

黄黑妮：大家好，我是黄黑妮，是北京出生，在北京高中毕业之后，下过乡，在美国受的大学教育，在意大利也完成了艺术学院的文凭，留在意大利，我做过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老师，从1994年开始，参与了意大利帮助移民融入意大利社会的工作，我工作的这个协会叫做“援助发展中国家紧急事务协会”，我们这个协会在30多个国家都有项目，在中国来讲，大多数的移民是来自浙江的，跟浙江的学校和意大利的学校有一些姐妹学校的关系，一共有20所学校，我们经常都有一些往来，互派教师之类的。关于帮助失学儿童，我们在湖南、贵州、四川有一些小的项目，主要是扶贫，帮助一些失学儿童的妈妈脱贫，现在正在做叫做兰草计划，可以在网上找到，大概就是这样。

主持人：再介绍一下我叫刘洲鸿，来自南都基金公益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以后，就把农民工子女教育作为基金会关注的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发起了一个计划，叫新公民计划。

新公民计划，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这些农民工子女，尤其是流动儿童，让他们能够在城里更好地成长，融入这个城市社会，也是让社会更好地接受这个群体，我们主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支持一些民间组织，支持他们的一些公益活动，去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一些学校，比如说支教活动，艺术教育、科普教育等方方面面的。

第二个方面，我们支持建立这种民办的非营利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我们叫新公民学校。因为以前，这些孩子们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就是进入公立学校，政府办的公立学校，一般很难进去，交很多的赞助费，有很多的门槛，很少孩子可以进去；第二种选择进入私人的打工子弟学校，那种学校一般条件比较差，师资比较差，这些孩子受到的教育，就是比较差，很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我们办新公民学校想动员社会的资源，争取政府的支持，是一个公益的学校，政府有可能支持。提高办学质量，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这几年来办了一些学校，目前正在进行中，状态越来越好。

主持人：我们上午进展还是很顺利，到现在时间也是基本上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尤其是先征求一下中方的意见，因为我们下午本来是1：30开始，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提前一会儿，我们11：30左右就可以结束的话，1点钟，要不大家也没有地方休息，可不可以1点钟开始。因为结束完了，我们布场卸了，我们直接吃午饭去了，今天议程差不多完了，我们下午的议程想提前到一点钟，接下来先请周艾丽把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方法介绍一下，开这个会，是需要有一个成果，先是大家提出来这方面，面临着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这个分论坛，关注的这个领域有的一些什么问题，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接下来，再谈谈，可以有一些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看能不能形成一个方案，一会儿请周艾丽介绍。

周艾丽：我就简要介绍一下，今天下午开始我们正式讨论工作之后的一个工作方法，我刚过来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这个会议的规模非常小，其实一共是20个人，有5个欧洲的参会人加上15个中方的参会人，为什么这么小，这个方法英文是Desmodo，意思是，一种大家集体参与讨论、集体思考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国外很多的会议上都有应用的，它叫集体思考方法。

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是讲究一个从现象到属性，我们先去看，我们现在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再从这些问题上提炼出来这些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针对这些本质，我们如何去设计方案，如何去行动，这样一个完整的思考方式，在这样思考中，我们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要积极的参与思考，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发言。

大家看到我们接下去的工作的方法从表达、倾听、讨论、分析、总结，我们今天早上花了很多时间去倾听，因为是跨国的会议，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我也很感谢大家的耐心，接下去我们今天下午就具体的事情来说，我们是分五个步骤进行讨论的。

首先是提炼关键的问题，我们在移民子女教育方面，从中国的角度和从欧洲的角度分别遇到什么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把这些关键问题提炼出来，形成我们共同的问题。

第二个步骤是交流中欧经验与教训。针对这些关键问题，我们在座的各位，肯定是有过很多努力了，我们在这个领域，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经验，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分享，大家可以中立的思考拿出一个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经验来。

第三个步骤是提出最后的展望。我们现在已经做了这么多了，对未来来讲，我们想如何更好地动用社会的资源，如何更好地动用移民本身，让大家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个步骤，就是把第三个步骤落到实处，看我们大家有没有可能，共同地或者是个别地形成一些合作的方案，研究方案或者是行动方案，都可以。

第五个步骤，中欧共同挑战的总结，这一个共同挑战的总结，是有四个挑战，等一下我们下午也会告诉大家，我们要去梳理这些共同的挑战，在我们这个移民子女教育这个领域当中的体现是什么。

一共是这五个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是三种，个人思考、微型组归纳、大

组再归纳，我们是一个小组讨论的形式。

下午，我们打算是先进行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步骤，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的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些步骤都完成，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大家的进展，我们再去决定我们会议的议程，因为我知道有好几位客人都是明天早上一整天都有事情，所以说如果今天下午就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努力做。现在大家可以到二楼吃饭。

时间：2010年7月10日（下午13：30-18：30）

主持人：我们下午的会议开始！下午时间很紧，还有很多的议程。上午周艾丽基本上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会的开法，我一会儿再讲一讲。根据中欧论坛的开法，每一个论坛开法差不多的，先是我们这个论坛关注的问题，大家认为最关键的五个问题是什么，接下来就这五个问题，交流中欧双方在这方面的经验交流，最后就是对未来的行动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案。

所以我们现在也分了三个小组，我是想这样，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环节讨论完了以后派一个代表上来，把这个小组的一个结论写下来，也陈述一下，代表这个小组陈述一下。我们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关键的五五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共识，最后我们有可能会有15个问题，也可能只有8个问题9个问题，我们选最关键的5个问题形成共识以后我们往下走，就这五个问题我们做了一些什么经验，有一些什么案例分享一下，每一个小组派一个人上来陈述。第三个环节，针对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什么，这是第三个问题。

接下来进入第一个问题，就是提炼关键问题。现在是这么安排的，每一个人可以先思考一下，再小组归纳，完了以后，我们再上来做大组的归纳。现在安排的时间是个人思考15分钟，小组的归纳是20分钟，大家可以自己安排，我觉得不用想15分钟，5分钟就够了，然后小组归纳，推举一个人上来介绍小组的情况，我们就开始。

A组讨论片段

段成荣：第二个，这些移民子女，国内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跟欧洲的移民子女之间他们相比有有一些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这个可能是我们讨论社会政策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第三个问题，中国也好欧洲也好，移民子女他们接受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当前的实际状况怎么样，这也是我们判断问题一个基本出发点。

第四个，中欧双方移民子女教育领域，现在面临哪些主要的困难和挑战。

第五个，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在解决移民子女教育上目前主要的政策，主要内容是什么，我比较关心这几个问题。

主持人：大家讨论得怎么样了？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黑板上的内容）A组提出了6个问题：

第一个，融入社会；

第二个，家庭教育；

第三个，文化传承；

第四个，丰富加强移民子女的力量；

第五个，在融入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

第六个，反对歧视，理解尊重移民子女，（媒体的立场）。

B组提出了以下5个问题：

第一个，文化差异（家教、语言…）；

第二个，家庭教育；

第三个，教师质量问题；

第四个，移民子女出路问题；

第五个，本地家长歧视移民家庭。

C组提出了以下5个问题：

公平教育/偏见

第一个，政府如何通过法律解决；

第二个，NGO的作用；

第三个，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差异

第四个，本地人如何接受移民家庭/移民子女？

第五个，媒体如何正确反映移民情况。

主持人：三个小组都有了大家都关注的中欧双方，都认同的移民子女教育共同关注的问题，A组6个，B组5个，C组也是5个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从这些问题里头，找出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五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展开下面的讨论，大家要注意是中欧双方都关注的问题，如果中方觉得特别重要，欧方觉得那不是问题，那也不能算作是问题。

各个小组就不要报告了，因为时间也很紧张，咱们写在上头，大家都看得见，大家看一看，我觉得有一些问题是合并的。这个整合难度很大，我尝试一下。我觉得从第三组他们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一点，如何整合各方的力量来解决移民子女教育的问题，你看他把这个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划出来了，政府、媒体、家长、NGO、社区、居民、老师，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我刚才在A组也听到我们那位欧方的人也在讲政府、媒体、学界，这个算不算，如果大家认可的话，如何整合各方的力量整合移民教育社会融合的问题，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重要的问题？

郭林凤：刚才Celine说的意思是，我们没法改变怎么提高移民家庭的收入，这不是子女教育可以改变的问题，这不是最根本的现象，我们这些利益相关方如何对待这些孩子，这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核心问题是公平教育的问题，你怎么去对待这些，衍生出来的应该怎么做。

主持人：你们觉得要表述的公平教育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刚才理解你们是要整合各方的力量。

郭林凤：最后是要整合各方的力量，最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主持人：能不能形成你们的问题，我刚才理解不太正确。

Celine Dumont：其实当一个移民儿童来到一个国家之后，来到一个学校之后，其实周围所有的体制，比如说有一些经济利益，有学校、家长、社会。

主持人：这个我们都理解，关键是她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

Celine Dumont：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从意识上意识到移民的儿童是平等的，现在大家的偏见，觉得这些儿童这些大人来到我们的国家，是要抢夺我们的资源，抢夺我们的财富，这些孩子们来到我们国家里面还会带来我们一些东西，文化的多元性，带来他们的认识，这是一个互相的过程，大家所有人应该是平等的。

主持人：刚才我在C组听到的公民教育大家有这个意识，这些移民不是对社会有害的，是对这个社会有害处的，能不能从公民教育这个角度来概括一下。

郭林凤：其实就是歧视，我们要解决这个歧视问题，我们要用公平来解决。

主持人：这个也应该算是一个问题。

郭林凤：所有产生这些问题，孩子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周围的人有问题。

主持人：你们组也列了6个问题，B组有5个，A组有6个，有17个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可以归类的，大家有什么想法来归类成5个？我自己想法是两方面，教育方面和融合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家庭教育、教师质量、学校，这些都是教育方面的，你说融入社会、文化传承，融入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些我感觉属于融合的问题。从这两个角度归类怎么样？

我感觉教育方面也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教育公平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教育

质量的问题。关于融入方面也可以分成反对歧视，他们在融入当地社区的时候，如何保存他们自身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一些风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地的居民如何接纳他们的问题。

听听大家的意见。

刁文：我觉得很简单，融入是现象，文化差异是现象，都是要面对的问题，歧视也是你要面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多种方法，有的是教育的方法，有的是其他的方法，今天的主题是中欧之间共同教育的方法，把这个融入现象通过教育怎么解决，我们把现象归类，哪些是五个最重要的现象，这个教育解决什么问题，一下就分类出来了

主持人：你有什么建议？

刁文：现在这里面有融入的问题，歧视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有文化传承的问题，还有公平的问题，这五大问题，现在看来中国和欧洲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是五个相同的现象，同样，我们的问题是教育，教育怎么解决这五个相同的现象。

主持人：你的意思分两类，一类是融入的问题，一类是教育的问题。

刁文：不是，一类是现象，一类是方法。

主持人：我们现在说问题不是方法。

刁文：问题也是在这儿，融入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歧视的问题。

主持人：我觉得你越说越远了。

郭林凤：首先是现象，不平等是现象，然后是问题，比如说歧视，就是一

个问题，我们要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现在我们说问题，比如说教育的不公平是问题，歧视是问题。

郭林凤：因为歧视产生了这些，因为歧视产生了这些问题，为什么政府没有公平教育呢，因为政府包括很多人，潜意识认为这个移民本身是来争资源怎么怎么样的，跟本地人不平等这就是歧视，他说这是态度问题，造成了这个。我们能改变的也就是改变我们的态度。

周艾丽：你们那组最后的总结问题就是歧视的问题。

张传文：家庭教育方面的不同，也是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歧视，学校教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歧视，包括我们刚才事实上列的这么多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要能够消除这种歧视的影响，那可能就会促进他们教育和社会的公平，我们是把公平和偏见或者是偏见和公平或者是歧视，作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郭林凤：教师本身对孩子不公平，我们要培训教师如何对待这些移民的子女。

主持人：我们把歧视作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大家觉得。

周艾丽：我不知道周老师，这个歧视单单是移民子女以外的人对他的歧视还是包括了，因为移民子女本身也是一个。

周皓：内部本身就有，不平等现象就是有的，移民内部也是有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歧视。

郭林凤：是双向的，当地社区要接纳他，他也要融入。

主持人：其实我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们觉得农民工子女或者是移民，

他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就是教育的问题，有上好学的问题，这是教育的问题。第二个怎么融入社会这个问题，用融入这个词不太好，双方的融合，融入好像是被动的，教育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可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上学机会的问题，有没有机会上学。第二个，他们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质量的问题，如何从教育的问题解决，第二个从社会融入这个角度来说，关于社会融合，他们最重要的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他们有没有这种平等的公民权来到城里以后，能不能享受到一些，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教育是最基本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权利，福利、保障。

刘文华：谈这个问题越弄越多，现在不是有成果了吗，就从这里面挑吧，要不进行不下去了。

主持人：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既然都讨论了，我们就从这里头找吧，家庭教育出现次数最多，是不是算一个？A、B、C组都提到了。比如说家庭教育大家都提到了，可不可以作为一个问题先写下来？第二个是文化出现比较多，文化差异。歧视可以算作一个，已经有三个了，再往下？媒体的作用也是一个。

王春华：媒体跟政策导向是一体的，是服务于NGO还是服务于社会本身。

主持人：作为一个问题怎么表述呢？媒体，我不是太理解。

周皓：媒体如何正确反映移民的情况？

蔡女士：不是正确，在反映中存在很多问题。

主持人：最后一个，如果说媒体的话，政府更加重要了。

刘文华：说歧视，应该是忽视，他是被忽视了，被忽略了，歧视是什么。

主持人：你别忽视了，媒体可以引起关注。说了四个，还没有说到政府，我觉得政府也很重要，第三个也提到了，第一个也提到了。

周艾丽：我们这一组讨论的结果欧洲政府的政策好像没有那么大问题。

主持人：没有我在A组听到他们提这是政府的责任，要推动政府立法各个方面，C组也说了。

翻译：说到政府的时候，政府有良好的意愿解决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

主持人：大家统一一下觉得第五个是哪方面最重要。

蔡女士：NGO。

韩嘉玲：NGO是说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我们现在是说问题，不是解决方案。

周艾丽：我觉得这几个不在一个层面上，歧视是一个根源，因为歧视有家庭教育问题，有文化差异的问题，有媒体反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一组讨论的时候，我们说了移民子女本身，公民的意识，首先是对方对我们有歧视，自己本身移民子女自己不够自信，对自己的权益没有更多的意识，他们融合进去社区之后，历史上也是有一些缺陷的，能不能分成这两块，就是歧视是根源。

王春华：分几个层面来说，歧视是一个大的现象，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又分哪些，把歧视作为一个大的方向来说，这个就可以不考虑，这个歧视是一个大方向。

主持人：这样我们就不把歧视所有一个问题，从利益相关方，我们从C组提

出的。

周艾丽：歧视可以保留下来作为一个根源性的问题，我们接下来继续讨论的话题，需要细化。

主持人：有一点太大了，从利益相关方，家庭、媒体、公众、NGO、政府这几个方面来谈。

周皓：我有一个问题，包括家庭教育的话，家庭和学校教育同时包括在内，要不然你学校教育没有，学校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Isabe Eiriz：第一个关于歧视方面，因为大家刚刚说这个问题太泛了，这个问题是一个核心的，因为很多问题都是因为移民子女的教育和社会融合问题，都是因为外部对他们产生的，她觉得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她想问一下，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家庭教育从字面上理解，是不是说父母对孩子的一种教育，这是一个问题的话，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是存在问题的，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社会或者说第三方来去对父母作要求，你应该更好地教育你的孩子，这样子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外来一个人，对你说，你要对你孩子进行教育，那时候你心里面会高兴吗。

主持人：她还是反对这个家庭教育放在上面。

翻译：她的理解就是家庭教育是不是要第三方来教育。

主持人：从中国的情况来说，很多农民工本身文化程度不太高。

Isabe Eiriz：她解释了一下，觉得对于孩子的教育方面应该是要学校和家庭双方面一块儿努力，不是有一个外在的声音比家长地位更高，对家长进行命令你要好好教育你的孩子，不是这样，应该是一种平等的角度，她可能还是对我

们所说的家庭教育具体指的什么，是说家长好好教育孩子，还是说家长应该把孩子的学校教育放在首位，还是其他的，可以解释一下，可能就是一个问题。

主持人：哪位是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解释一下。

韩嘉玲：鹿老师是那个方面的专家，他刚刚给我一个任务让我把他的思想说出来，刚刚这一组在讨论家庭教育的时候，好像并不是说，这个家长缺乏教育，好像是说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可能是有一些不同教育的需求，还有流动儿童缺乏一些照料，由于孩子生计的关系，孩子缺乏照料，他谈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谈给家长什么教育，是家庭教育的缺失。鹿老师要我表达的意思是说，打工子弟学校里面家长缺乏三个方面，一个是缺乏参与学校的管理，对学校课程的开发以及家长跟学校联系。

主持人：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家庭的问题。

韩嘉玲：他不是有一个关爱家庭这样一个中心，他要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要关注家庭教育是从这些方面。

主持人：现在的问题，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家庭教育很重要，欧方不认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往下写，是不是这样？

翟东海：刚才解释成家庭教育的缺失。

主持人：你再讲讲是不是她们认可这个问题。

翟东海：不是说怎么教孩子，是你缺了这一块。

韩嘉玲：我们这边专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必须是他们提了我们才会写上去。

Isabe Eiriz: 你刚刚说家庭教育的缺失，她不能理解，怎么可能，家庭教育的缺失，他的父母肯定都是会想去教育他的孩子，去更好帮助他的孩子，每个父母都是这样的心愿。为什么这个家庭教育缺失，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主持人: 其实这些农民工都很忙白天，一个是没有时间，第二个文化程度比较低，也不懂得这些，没有这些方法不懂得这些技巧，有时候很粗暴。

Celine Dumont: 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一个人说话时候另外一个人不能说话的。我个人而言，我也不很喜欢家庭教育这个词，为什么，可能还是太专断了，应该是家长和学校之间，应该要互相的配合，互相给孩子一些教育，而不是说互相的一种互动，不应该是一种要去教育家长怎么怎么样，还不太喜欢这个词，她感觉就是要教育家长的感觉。

赵虎: 我觉得家庭教育有它的一套方法和理解，学校教育有另外一套内容和方法，这个问题出现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对接不是特别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可能是沟通的不畅或者是什么问题，造成了现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没有衔接起来，是这个问题。

Maria Tsabel: 关于家庭教育问题，关于这个用词上我觉得没有什么异议，觉得家庭教育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于移民儿童而言，在西班牙对所有的家庭对很多孩子，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专对于移民儿童才有的问题，这个问题针对性不是很大。

主持人: 那把这个词去掉。

Isabe Eiriz: 首先关于家庭教育这个词，家庭教育，任何一种形式的教育不是一个问题，不能构成一个问题，是一种资源，所以觉得不喜欢这个词。

翻译：刚刚对于家庭教育，给她的同事在解释，其实这个家庭教育并不是说，由高向下对父母们…

主持人：家庭教育不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不要翻译了，我们中方已经放弃那个问题了。我们下面不要评论，就说问题，就说问题。

段成荣：我想提一个，我们这个题目是移民子女和社会融合，不是社会融合和移民子女，是移民子女在前，我们中国农民工这些，刚才大家讨论了很多，流动儿童说是有300（音）万，还有5800留守儿童，那些孩子讲歧视也好，文化传承也好，可能不是很合适。

主持人：你说这个欧方就更不认可了。你说留守儿童他们更不会接受了。

段成荣：这个东西本身要讨论了，在我们中国这个问题本身要讲清楚，至少要讲清楚。

周艾丽：但不是在我们这一次讨论范围内。

主持人：你可以翻译一下，中方所说的移民儿童还有留守儿童。

段成荣：应该提到。

周艾丽：应该提到，因为刘老师今天早上已经提到了。

主持人：主要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把下面大家觉得更重要的两个问题。

翻译：我刚刚给解释了一下这个名字，移民子女不仅包括流动儿童还包括留守儿童，因为流动儿童可能是欧洲和中国都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留守儿童我们中国为数很多，欧洲不是很多。她当时进行了一下反驳，不是的，在欧洲虽

然不是很多，但也存在。比如说，比如说国内的战争，他的父母把这个小孩送到法国或者是送到其他的国家，这也是和他们父母是分离的，这样数目不是很多，还是存在，她们有这种批判精神。

主持人：我们讨论下面两个问题，先听欧方的意见，除了这三个问题，还有哪两个问题最重要，我们中方没有意见的话，就把那两个问题写下来，请她们先提。你告诉一下，发言时间要简短一点，时间很紧张。

Isabe Eiriz：尽管我们面对一个主题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有所发言都畅谈，其实是对双方文化的丰富，我们今天为什么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找出我们的不同点，共同点，大家一起进行探讨。

主持人：所以说今天这个对话非常有必要，所以我们继续往下。因为我们要找五个，或者说大家觉得这三个就够了。现在我们有三个问题，你觉得还有哪两个问题，重要的，你提出来，大家都在想。

王春华：刚才说到了教师的问题了，现在有吗。教师问题是共同存在的，西方和我们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共同问题下，可能他们认为教师对孩子的歧视是问题，我们认为教师的质量是一个问题，在共同问题下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教师是一个共同的问题。

周艾丽：我觉得教师是什么问题，他们会觉得太泛了。

主持人：没有关系，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写出来。

王春华：因为教师对孩子的歧视有问题，我们觉得教师质量。

主持人：教师质量应该算是一个问题。

翻译：刚才给她们解释了一下教师问题，她们觉得没有问题。

王春华：没有问题，就不要了。

主持人：他们说可以。

王春华：要有效的进行，从你主持人的理解上，先弄出五个问题来。

主持人：还需要列一个吗，还是就这四个。

王春华：移民子女出路，因为孩子没有未来，他们感觉不到未来。

翻译：她们说没有问题。

主持人：太艰难了。

翻译：刚刚说关于移民子女，她们没有说到，有的时候因为教育问题，其他的问题，感觉到自己没有出路，没有未来，她有一个补充，这种情况下，移民子女很有可能走向犯罪。

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很不容易达成五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茶歇十分钟，接下来再讨论。

提出的五个问题（黑板上内容）：

第一，教师问题；

第二，第二，文化差异及传承；

第三，第三媒体的立场及作用；

第四，第四，公众意识；

第五，第五移民子女出路。

茶歇十分钟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讨论比较激烈，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形成共识，中欧对话最大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形成什么共识，更大的意义可能让大家都充分表达，增进双方的了解。好在我们今天互相认识了，也可以建立联系，以后可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继续交流，比如说电子邮件，或者别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的议程，本来是两个步骤分开的，针对这五个问题中方和欧洲有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和实践做法，互相分享一下。对于未来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合作、建议、方案，我想接下来可不可以把这两个环节整合在一起，既分享我们的经验和做法，同时也对未来有的一些什么考虑，一起讨论，再总结分享。

可不可以，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吧？

翻译：她想知道这两个整合在一起需要多长时间？

主持人：我们希望6点钟结束，还有两个多小时。

翻译：你刚刚说要整合在一起，刚才Maria Tsabel就问了我一个问题，第二个步骤和第三个步骤分别是什么，第二个是总结过去的经验，第三个是提出未来展望，第二个步骤是关于过去的经验，第三个是提出未来展望。然后Isabe Eiriz马上反驳我，我们怎么可能整合过去和未来。

主持人：不是整合过去和未来，是对过去和未来有什么想法，不叫整合，就是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开始吧。各个小组讨论到5点，然后5点以后，各个小组再来说自己的交流成果，留一个小时来分享。

时间到了，各个小组讨论得差不多了，我们休息15分钟，各个小组派一个代表把你们讨论的结果写在上面，15分钟以后我们再开始。

主持人：刚才各个小组都讨论得很激烈，都有每个小组经验的分享对未来的一些设想。我们今天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了，归纳各个小组的观点，形成我们整个分论坛的观点。先是经验，要不我们请黄蓉给我们欧方的朋友翻译一下，所有的过一遍，一会儿我们再归纳一下。

Isabe Eiriz：我有一些需要补充的方面，在一个移民家庭里面，小孩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家长周围的朋友帮助克服这些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应该是向谁求助。还有一个，提到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她举了一个例子，乡村的孕妇和城市的孕妇她们所面临的问题，她们所关注的问题还有障碍是不一样的，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的，可以操作的，结合她们自身情况的一个方案。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当这些移民的小孩和家长，他们遇到问题找谁倾诉，跟他们的邻居、朋友还是相关的协会或机构，这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接下来把刚才大家讨论的经验，梳理一下，现在是比较多，我们能不能一条一条过，有很多可以合并的。我刚才大概自己梳理了一下，我觉得可以分这几类，第一类，提供交流平台，包括社区中心，也是提供一个交流空间的作用，包括支持的网络，还有包括无国界教育网，那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样作为一类经验，可不可以？

Celine Dumont：你看你刚才说了一个交流平台比如说网络、社区，还有RESF协会，可以归纳一个交流平台，我觉得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时间和精力，来去一个一个细节讨论，最后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就是交流平台，这样不是白费了吗？

主持人：没关系。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是一条一条全部罗列出来，还是归纳整理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还可以全部抄下来，就是分论坛的成果，就是听大家的意见。

也可以保留，但是分分类，具体可以保留，比如说我觉得第二类是一些服务

性的，语言方面的帮助，自我认识的课程，技能的课程，就是提供一些具体的服务，可以把这些归纳在一起，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听听欧方的意见。

刘文华：我们上面提供一个大的类，比如说提供平台，经验一二三，这样保留下来，就可以了，就是归纳总结一下，具体的细的点我们也可以保留。

主持人：对，因为有的是重复的，细的可以保留，分一下类，同类的放在一个类里面保留。

Celine Dumont：这样的话，损失更小一点。

主持人：我们不是把一些过滤掉。刚才是提供交流平台，我先说我的，大家有更好的想法都可以。第二类，就是提供一些具体的服务，包括一些语言课程，包括自我认识的课程，包括职业技能的培训，也许还落了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可以归到服务类里头去。

Isabe Eiriz：自我认同是什么意思？

王春华：自身本身就有多元文化，就是具有多元文化，认识到自己的自我价值。

张玉洁：对自己的认识。

郭林凤：我们认为RESF应该放到服务类的。

主持人：刚才有的朋友提出，要把这些原始的东西拷下来发给大家，我们会做这个的，我们这个梳理到时候也会发给大家，大家也可以不认同这个梳理，你完全可以回去自己梳理，我们这个小组要有一个结论，代表这个小组在大会上的报告。

Celine Dumont: 自我认定自我认同，上面写的一些词句觉得是不是太过于概念，界限太过于模糊了。

主持人: 我觉得他们所说的自我认同，应该是一个自我身份的认同，就是自我认同。

Isabe Eiriz: 还是这个自我认同，还是觉得这个有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去另外一个国家，怎么样会有这种自我认同，难道通过外界跟你说，你是有这种文化这种身份的，还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才是自我认同，需要外界帮助吗，还是有这种意识在里面。

赵虎: 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郭林凤: 我先举手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比如说中国的根，第二根不要变成黄香蕉，外面是黄，里面是白，接受他的主流价值，还要保持我们自有的传统，就是保持文化传统的问题。这就是多元文化，你要保持我文化传统，这是文化多样性。

赵虎: 是这样的，我当时提是这样想的，很多孩子，我接触到很多打工子弟的孩子，他们可能是两三岁或者是一两岁就来到了北京，甚至有些出生在北京，但是他们没有北京的户籍，所以他不认为他是一个北京人，别人也不认同他是一个北京人，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他从小生长环境在北京这样一个大环境，他可能是一个湖南人，现在的实际状况，他既不是一个湖南人，因为他没有在湖南生活的经历，没有湖南的生活方式，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北京人，因为外界都不认同，他觉得外界都不认同他。

主持人: 明白了，就是身份困惑。

赵虎：还有自我认同这一部分，现在提供了这样一个课程，让他认识到，我是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湖南人。

王春华：你认为不是北京人又不是湖南人，你变成既是北京人又是湖南人，这是困惑问题。

主持人：我觉得更多是外界的认同。

赵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

主持人：他可能困惑他的身份，又不认为自己是老家的，又不认为自己是北京的，就是有一种困惑，教他怎么正视自己的身份，有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什么意见吗？关于这个，我们再往下。第三点，大家提到的比较重要的就是要发挥媒体的作用，包括一些公共的媒体，包括这个群体自身办的一些刊物来发出他们的声音。

张玉洁：我觉得发出声音是属于公民参与的部分，会总结到公民参与吗？

主持人：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多的就是要重视这个移民的参与。再一点，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重视移民的参与。

翻译：想问一下，具体是参与到什么当中去。

主持人：每一个小组有提到，要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翻译：重视移民参与具体是什么？

主持人：就是有一些活动的时候让这些移民可以参与，一些政策出台的时

候是不是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这里头没有提到。

翟东海：这个是跟经验相关的，是巴黎举办了一个叫“非洲周”的活动，这个没有得到非洲移民的认可，原因就是组织这个活动的主办团体里很少是非洲裔的人。

张玉洁：在社区中心做一个项目会碰到这些流动的居民，让他们自己参与进来，听取他们的需求，让他们作出符合他们的项目。

周艾丽：还有一个是直接让他们办一些项目。

张玉洁：他们办的报纸全部是由打工教师参与的。

Isabe Eiriz：关于移民的参与，比如说让移民参加项目，来聚餐与政府的决策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参与的范围，在要求重视移民参与的同时，应该考虑到移民参与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兴趣点，他们是不是愿意参与，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是不是想去参与等等，这些不能一贯地说让他们参与，而是要考虑到他们的兴趣，他们的需要，他们的困难等等。

提到的关于移民参与问题，我的经验，不仅仅就是鼓励他们去参与，另外一方面会给这些移民进行培训，让他们去对一些东西感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到这个当中来培训。

主持人：因为英语没法写了，到时候会翻译过来提供给我们欧洲的朋友。关于经验这一块大家还有没有补充的意见？刚才您提到的公民意识。

张玉洁：公民参与。

主持人：好。

刘文华：我觉得NGO之间的合作我不知道有没有合作经验。

主持人：加强NGO的合作。

刘文华：在中国NGO本来就很弱小。

主持人：刘文华提出来要加强NGO的合作，这个应该是将来应该加强的吧，这个好像是下一步要加强的地方，不是说现在大家有这个经验，很有利于帮助这些移民。如果大家没有别的意见，我们继续下一个，就是未来的方向。

这个好像不是很好归纳，我看到的从A、B、C过来的话，A组比较强调公平教育的机会，一个是公平教育的机会，第二个，继续做社区中心的模式，第三个要提倡多样性，第四个还是要继续发挥媒体的作用，这个不太好总结。第五个，要重视移民的积极参与，是C组提出来的。要争取移民的权利，第八是无国界教育网。

Isabe Eiriz：关于加强教育平等的问题，只需要加强教育平等吗，平等有很多方面，他们身体健康的平等，他们培训的平等，安全的平等等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教育平等。第二个，今天早上谈到关于消除偏见的问题，可能说起来很简单，在操作的时候，需要公民从根本的意识上消除他们的偏见，同时要知道，移民他们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等等都是非常不可缺少的。举了一个在瑞士的例子，在瑞士有很多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对于陪伴老人去护理照顾老年人，取得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作用。让社会消除偏见，不仅仅一些口头上，同时要让大众切切实实明白到，移民对于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尊重他们。

主持人：可不可以归纳成两点，一个是争取移民的权利，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教育、健康、培训、等等。第二个是消除偏见，正面宣传移民对于这个社会的作用，对公众进行教育，加强这两方面。

还有什么补充的？我们中方的大家有没有什么补充意见的？就这样了。我们今天的讨论基本上结束，接下来我们艾丽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发给我们欧方的朋

友，让他们也继续留存。关于明天怎么安排，一会儿艾丽给大家讲。

黄黑妮：我说两句，我只是想讲一下，欧洲方面欧洲人员和中方其实工作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碰到一起也是可以有一个机会，了解我们怎么工作的，可能在意大利、法国、瑞士，我们可能花一倍两倍的时间，在这里可能只是用1/3的时间来解决，我们的方式是越细越好，任何是我们想得到的都要写下来，包括我们产生这种想法的过程，我们都要理出来，让大家都非常清晰自己的想法，最后总结出来的东西我们也要很具体化，刚才我们几个人也讨论过，总结得很概括，很清晰。因为我们这些人具体从最底层开始的了解整个工作流程，希望看到更具体的过程，就是这样，我就说这些。

主持人：其实我们全程讨论都有记录，最后都可以发给大家。我就主持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支持，接下来请艾丽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的一些安排。

周艾丽：其实我们明天上午还有半天的时间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座的有很多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赶过来明天的讨论会，我们现在五位欧方参会人，将要去香港的五位中方参会人会有一个小的讨论，我们也会针对我们今天工作的成果，进行进一步的细化，我们也可以在明天完成。

翻译：明天要讲的是什么？

周艾丽：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步骤是中欧面临的四大挑战，我们明天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明天还会做一件事，把今天的讨论成果进行一次梳理，达成共识。明天下午我们有一个参观的活动，就是去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是我们的一所新公民学校去那边参观，我们首先会参观校园，会有我们机构的负责人对新公民学校进行介绍，因为新公民学校到现在已经运行了3年了，我们的社工部的主管也会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社工项目进行介绍，这个安排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有没有兴趣参观，是小学。

翻译： 想知道一下明天将会到场的五位朋友，现在都在现场吗？

周艾丽： 有两位已经走了，他们明天上午下午都会过来。

翻译： 明天晚上本来讨论是结束了，明天晚上她觉得很容幸有机会来到中国和中国同仁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明天晚上大家有时间的话，大家一起吃饭并且一起讨论。

周艾丽： 明天晚上谁有兴趣。

主持人： 最主要是去香港那些。

周艾丽： 我现在想问一下明天我们去参观新公民学校，谁有兴趣，除了欧方的人都会参加，还有谁会参与。明天参观学校是在朝阳区南三环，就是农民工子弟学校。

以下为黑板上的内容：

大组讨论出的经验：

提供平台

1, 网络/社区中心

提供具体服务

1, 语言

2, 生活技能

3, 自我认同

4, 无国界教育网

5, 发挥媒体的作用，重视移民参与，总结失败的教训，听取移民的意见，让移民自发举办项目，考虑参与的困难、兴趣、需要培训移民参与。

未来计划

加强NGO间的合作、争取移民权利（教育、生存…）、移民积极参与，了解移民需求、推广、倡导社区中心模式、提倡文化多元化、多样性、展示移民子女风

采，为其建立自信、发挥媒体作用，向政府施压、宣传移民的作用，加强社会对移民消除歧视和偏见。

A组经验：

提倡一个平台，让外来子女可以和本土儿童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能让教师共同面对孩子所出现的问题，面对困难，解决问题达到更好的磨合（不太确定是这个词）。

未来方案：

要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培养，人生教育的规划。未来的出路，不可能由我们来计划。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移民子女最好的教育。

B组经验

- 1，为青少年及家长提供免费法语学习课程，为家长提供学习。
- 2，媒体政策倡导的作用。
- 3，为青少年提供自我认识/认同的课程。
- 4，通过打工教师参与民办报纸，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同时，吸引社会关注，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提升他们的公民意识。
- 5，建立社会中心，提供以儿童参与为中心的课​​程，提倡平等公共的服务。
- 6，为他们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看不清）理念免费4个月培训。

未来方案：

- 1，社区中心模式倡导政府关注，社会关注，农民工群体自身意识。
- 2，接纳多元文化共同学习，提倡多样性。
- 3，推动媒体发挥应有的作用，
- 4，宣传和提倡学习成果，认可打工子弟的同时，引起社会关注，
- 5，开展农民工的教育，促进（看不清）参与，引起倡导和社会关注。
- 6，在社区中心推动社区居民流动群体自身参与，建立社区支持网络，提升公民权利。

C组经验

- 1, 失败的经验, 巴黎某街区举办“非洲周”非洲侨并没有积极的参与,
- 2, 政府提出“两为主”解决办法, 公立学校和专门学校, 中方认为专门学校积极响应, 消除偏见, 在爱尔兰出现(看不清)的移民儿童学校不成功,
- 3, 无国界教育网(RESF), 法国社会中教师, 同学及同学家长帮助移民儿童父母获得合法证件。

未来方案

- 1, 移民积极参与, 了解移民的需求,
- 2, 分享权力,
- 3, 推广RESF的经验, 有效利用资源。

时间：2010年7月11日上午9：30—12：30

周艾丽：今天我们首先把昨天没有完成的一项，中欧共同挑战的总结先完成了。这四个挑战是什么，我新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模式挑战，如何挑战当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走向真正可持续的和谐社会。我们讨论这四个挑战的时候，我们思维模式是，这四个挑战就是移民子女和社会融合这个领域的体现是什么？比如说在我们这个领域，有什么样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怎么做是让这个模式变得可持续，这是第一个模式挑战。

Celine Dumont：发展是说什么发展的？

周艾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题目比较泛，就是讨论看看怎么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细化。我们先开始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在移民子女和社会融合问题上，我们当前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我们怎么做可以变得更加持续。先是个人思考，

韩嘉玲：模式的挑战我有一点困惑，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方法，五分钟以前我得知什么是模式，你指这个是什么模式，是工作的方式还是什么？我们在中国都有不同的模式。

周艾丽：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这四个挑战是上一届中欧论坛总结下来的，是很多很多话题提炼出这几个问题的，这个模式可能指的，比如说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人口增长的模式，指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模式。

韩嘉玲：这样我们才可以说，否则我们放在流动人口，学校的，儿童的，是移民子女教育的模式。

黄黑妮：整体，还是具体到小的部分。

韩嘉玲：新公民不是一个模式吗，你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这就是一个模式，你现在要我讨论是一个宏观的模式还是具体的某一个模式。

周艾丽：我觉得是在移民子女教育社会融合这个话题下的，没有具体到这个新公民学校这个模式，是一个比较全国性的模式，我们全国基本上对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因为新公民学校是一个特别小的个案。

韩嘉玲：即使是移民子女教育模式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模式，好吧，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周艾丽：我们把这个模式都列出来做一个总结。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文件没有，这个文件就是对这个模式挑战有比较详细的一个解释，翻到第八页到第十页，这是对第一个挑战的详细说明。

韩嘉玲：我们的移民子女教育问题，事实上是在中国现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底下的一个问题，我提出来跟大家讨论，现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形成了这样一种对子女教育的模式，不要讲模式，这样子一种状态的影响，是不是去反思，我们谈很多问题都是讲怎么做都是小问题，我们从发展模式去思考，昨天我们很多人谈政府的心态，政府就是不想留他们，在政策制定里面没有考虑他们的因素，我们在谈什么样一种发展模式，会更有利于移民子女的教育跟融合社会，我是这么思考。

周艾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翻译：之前伊莎贝拉想发言的时候，然后Celine Dumont跟他说，不要发言，现在是个人思考的时间，刚才韩老师有发言，我就翻译出来了，Celine说，刚刚伊莎贝拉要说话了，没有让她说，现在可以说话了，说这是不公平的。

Isabe Eiriz：第一个是说，她不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第二点，我将会完全的听命于主持人，她让我干什么我就跟什么。第三点，在欧洲现在这种

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以经济为主导为导向的，没有特别的注重环保，这是一种不太持续的发展模式。第四个，强调说，当我们在关注这个留守儿童移动儿童的教育和社会融合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关注于孩子本身，还应该考虑到这个孩子相关联周围的事和人，比如说关注到老师，是不是足够的对于流动儿童的教育有关心，有没有足够的关心和用心；还要关注母亲，因为母亲在孩子身心发展过程当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要考虑到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现在这样一个现状会导致结果是什么，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总之说是两点，不仅要关注孩子，还要关注周围，要通过这个现状反思这个原因，以及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您对于她刚刚说的这些有什么意见，或者想要说的。

韩嘉玲：我觉得说的以经济发展这种发展方式，我想不止是在欧洲，中国也是，经济以增长10%这样一种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上去了，可是也带来了我们所未看到发展所出现的副作用，我觉得移民子女教育在这样一种，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发展政策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是一天两天解决的问题，发展模式的损失，在这方面我们是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翻译：她们对你们刚刚说的很赞同，现在中国这种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关于其他的关注生态、环保等等的关注，没有太多的用心，还是觉得以经济导向太过了。

韩嘉玲：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中国之所以可以作为世界工厂，很重要的是有廉价的劳动力，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之所以可以成为廉价劳动力，主要就是农民工，所以中国事实上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其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低廉的劳动力，听话的劳动力，我们现在经济发展，只要是廉价劳动力，在城市里头，你用完了以后，你再回你的老家，因此根本不考虑他作为一个人，他还有第二代的问题，所以有了子女教育的问题，这种发展模式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发生。

翻译：她说她想谢谢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

韩嘉玲：这样子的情况，欧洲早期发展是不是也像中国，也有相同的情况，我比较想了解在欧洲发达国家，是不是也有外来的民工，因为他们不是国内的劳动力，是外来民工。

Celine Dumont: 在法国也有这样的情况, 中国人数上可能规模比较大, 其实从近两三年来, 2009年2010年以来, 法国移民浪潮一直以来都非常非常热, 很多人想去美国工作, 以前工会没有过多关注移民的状况, 现在开始关注移民生存的状况, 他们会看到移民往往生活在比较脏比较乱比较差的地方, 做的是非常难的工作, 比较艰辛的工作, 并且他们的工资非常非常少, 很多移民没有合法的证件, 打的是黑工, 工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同时他们也意识到, 移民他们没有合法的权利, 例如工作方面的一些权利。所以在去年, 就是最近几年工会组织起来, 来进行罢工, 他们动员了在建筑领域、餐饮行业, 还有清洁领域就是服务领域的一些移民, 动员起来一起进行罢工, 他们这一次罢工就导致了法国的相关行业几乎是处于瘫痪的状态, 没有人愿意去替代他们的工作, 所以他也意识到在法国, 这种对于移民工的过多的剥削和压榨, 导致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太好, 太过于重视经济了, 而没有考虑到他们作为一个人本身的发展。

他们罢工, 工会的一些行动和关注已经有了一些成功, 他们取得的成果, 成功的帮助一些移民取得了合法的证件, 这样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到市场上工作, 不是像以前那样打黑工了。

Isabe Eiriz: 现在在广东, 有另外一个分论坛讲的就是关于移民工劳工的, 那个分论坛里面关于这一个话题, 可能探讨得更加的深入, 讲得更多。

韩嘉玲: 我知道, 我们一起做农民工的项目, 我是做子女。问一个问题, 就看到中国的报纸, 中国很多人也在那边打黑工, 我上一次看到一个报纸, 就是做旅馆里的打扫, 由于没有证件警察来了就躲警察, 躲在阳台上摔死了, 我只知道这个新闻的故事, 我不知道在法国中国的移民多不多, 我想知道。

翻译: 关于你刚刚说的那个在报纸上读的文章, 已经有两三年了, 当时是那个女孩自己跳下去的。

韩嘉玲: 是, 因为她害怕了, 只是说因为那个引发的, 没关系, 不用再讨论这个了。

翻译: 还有一个, 法国其实也有很多没有证件的一些移民, 但是他们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的是, 这些移民他们的孩子, 他们有权利上学, 他们可以不用付学校的学费, 因为法国义务教育是免费的, 他们甚至可以享受医药免费, 他们可以有一个免费的交通卡可以乘车, 在法国是这样, 在西班牙也是这样, 每一个小孩都

可以上学，有权利享受各种权利，这可能是和中国不一样的。

韩嘉玲：他们对中国有一点点误解，中国法律上他们也有权利上学，不是说他们没有权利上学，中国也是讲免费教育的，只是中国有一些潜规则的，国家的法律他们不执行，各个学校出现了很多的，有法律，他们不完全执行，这是执行层面上的问题，中国的法律跟法规上面的问题，他们都是有权在学校里面上学，并不是没有权利上学，只是要多交钱。

蔡晓芳：其实他们可以进到北京的各个公立学校，在成都我们采访，他们公立学校已经完全可以进了。

韩嘉玲：成都我不太敢说，在很多的省会城市根本没有打工子弟学校，所以中国是很不一样的，我只是想让她们了解，中国并不是不让他们上学，因为人口很多，所以说在进学校的过程，学校会用各种的理由来多收钱，即使针对北京市的孩子，你想进入有一些学校，也要收钱，所以中国很复杂，有时候很难跟国外的人说清楚，不是说不让他上学，法律上完全是可以免费上，但事实上不是，这就是中国。

翻译：她们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法律规定了，为什么就不执行，她们不理解，要怎么做才能够让法律受到尊重呢。然后举了一个例子，她的一个朋友是上海的，她后来去了西班牙，然后又去了瑞士，在瑞士学习一年法语的时间，给她颁发了一个合法的证件，她就可以在瑞士这个学校学习一年，过了一年以后就是非法的，必须去办证件。一年过了之后，在瑞士一家餐馆里面找到一份工作，每周工作44个小时，瑞士的医疗保险不像法国一样是公共的，是国家出的，瑞士的医疗是私人的，商业保险，是私人的。所以移民朋友就没有医疗保险。

她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些拉丁美洲的移民到了瑞士之后，一般都会租这样的房，一平方米，一平米的，这种状况下，只能摆一个床，只够在里面睡，晚上睡一夜，第二天就走，可能下面一天就会有另外一个人租这个房子，这就是在瑞士的情况。

她还举了一个例子，在瑞士有的父母亲比较忙，会把自己的小孩让别人看管，一个情况下是每小时6个瑞士法郎，让非法的移民去看管，每小时只有2-4个瑞士法郎。

黄黑妮：我说一点，讲法律的事，在意大利发生这种事情，意大利的第一步

移民法是在1989年写出来的，之后就逐步完善，因为意大利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他是往外移的，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浪潮，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不断的有非法移民涌入，就要不断的修订，第一部写得很抽象，具体不了，针对具体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办，只是给了一个居留，到1995年有另外一个法，这个移民法律是司法部长签的，就以司法部长的名字命令这个移民法，当时叫“迪尼”这个法律，我也参加了这个制定，当时有一些官员有很多问题不理解，就是关于中国移民的费用，明明市政府有大的招贴，贴在墙上，写着怎么办身份证，第一，第二，清清楚楚，还有中文，为什么中国人不去，我就说他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在中国法律这些不会按着那个来，我们习惯了，这就是他刚才讲的那个，因为习惯了，就不相信意大利的真的就是这样，所以需要有人解释，我们出了一份报纸双语的也是介绍他们的情况，不要害怕，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出现的。

韩嘉玲：是不是中国人要看到，他认识的人真的办了以后，对他来说他才会去办，是不是。

黄黑妮：对，包括移民也是，为什么都去意大利，在一八九几年，有一个海员跟着船流落到意大利，结了婚，又把他妹妹带过去了，慢慢就是他一家，发展成现在的几十万，因为一家人朋友、表哥、亲戚慢慢都过来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1984年，街上一个中国人都没有，90年代开始只有十几个，所以有问题就找会意大利文的人帮忙，当时我就去帮他们，你说什么他都信，我也是说的实话，变成我去做了很多工作，是这样，别人没做，他不敢做。

还有一个，我们大使馆领事馆也要告诉大家，有这种说法，我们是侨民，这不是我们家，千万要本份，千万不要涉及政治的东西，不要参与，我们不了解他们的政治，尤其是意大利这样的，但是他们是非法，要求合法化，就要有居留权。总工会发起一个罢工，在罗马那儿，连那个大车都准备好了，拉过去，只要有十万人参加就会通过这个法，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下，我就去游说，一家一家去讲，我说你没有证，你没有居留权，我说那你就去，他说那不行，反对意大利政府这不行，我说你没有去过罗马，就当去玩一次，最后去了四百多人，后来就得到了居留权。去时很害怕，就是说反对政府了，他还给我，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在意大利有意大利的一套，意大利当然是很糟糕，法律没有定就在卡在那儿，过两年还在定，慢慢慢慢在具体化，刚过去的人吃了亏，卡在那儿，或者怎么样，

到现在也是，有居留你就居留，但是你没有住宅，没有住宅说明就不能住，住房是非常贵的，你去警察局申请家人的时候，要看你的收入，扣掉租金以后，还有多少钱，这么一扣，就不够申请家人来的条件，就找人，假装你给我一个房免费，他不就可以申请了吗，又有住房，又有工资，还可以足够申请，就为了这个。意大利也很糟糕的，你给我八千欧元，我就给你，有60%以上中国人申请家人是靠八千欧元，这其实是法律的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在那儿打工，也会逐渐慢慢慢慢会发展，你要考虑他，他不会越来越糟糕，是越来越好，你允许他往前走，你不能不让这个家人团聚，这也是一个人性的东西，这是得到保护的东西，这个现在还没有做。

翻译：刚刚你说的在意大利家人团聚，给钱会给他出示一个证明，在法国不是说不可以给当地人付钱，得到一个证明，移民他们采取这种作弊的方式非法的方式，尽管他没有住房的证明，没有相关的手续，还是要家人过来，过来之后怎么办，没有合法的证件没有签证，但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就是一个没有合法证件的公民，她觉得这也是法律的一个漏洞，他们的法律导致移民通过种种的手段，通过非法作弊的手段让他们的家人过来，她觉得法律需要完善的，在很多方面人的生活有法律更重要的。虽然是没有证件，虽然是非法，一样是可以上学。

周艾丽：他们找工作，长大了以后升学需要有证件。

黄黑妮：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孩子，只要他是一个孩子，就可以上学。上到初中，是强迫教育，强制教育，高中要给钱。

韩嘉玲：义务教育就叫强迫教育。

翻译：他们比较人性化一点，这个孩子不管他是哪个国家，只要在他们的国土上都有权利享受教育，不是把他们作为一个非法的和合法的来划分，而是从一个根本的人上来看待。

黄黑妮：他说的是强制教育跟咱们义务教育是不一样，因为什么，这个孩子不来上，就有几个措施，第一个六天之后，去请家长，就会说明原因，出证明，三天之内家长要出现。后来还有一个中国不会做的，还不行的话，把孩子带走了，你没有能力带这个孩子，意大利家庭也在这个城市，你有权抚养这个孩子一直到18岁，这个非常严格。你如果是学生是可以，可以学生居留，你不是工作居留吗，即使父母有工作居留，你过了18岁，你也要马上作出决定，你是接着上学还是工

作，要不然你是没有。

蔡晓芳：那边有没有自然而然的在那儿生活十几年，自然就转了。

黄黑妮：你除非是那边出生的，现在允许，这是欧盟的意向，他觉得他更适合意大利的生活，感觉更像是自己的家一样，他可以申请，都可以申请，因为成年12岁就可以开始申请了。

周艾丽：申请容易吗？

黄黑妮：现在是政府鼓励他们融入，好办得多，根据欧盟的政策制定的。欧盟有一个是关于国籍问题，是有一个共识，这些自我认可觉得自己更是本地人的，他可以有申请，这是一个大方向，意大利是这样，意大利政府讨论过，现在可以这么做，可能意大利做得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多一点，他是根据欧盟有一个精神，曾经开了会，可能欧盟后来没有提了，意大利就接着往前走了，现在可以申请，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孩子要申请是要有家长去，现在我没有听说有，只有18岁以上，原则上12岁就可以，当时说是可以，但是没有人去申请，不知道怎么办。

周艾丽：我们刚刚对模式挑战达成了共识，在中国和法国都是因为这样一个不可持续，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模式下，忽视了移民他们自身的权益，这是对模式挑战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表现。

Isabe Eiriz：你刚刚说的共识，这个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大家既然都知道，希望从更深的角度上探讨，怎么让这个发展模式变得更加的和谐和可持续，通过这种改变，通过在法律上和政策上的领域让这个发展模式更加持续，这好像挺难的，本来中国人就不太尊重法律。

周艾丽：我们可以说得很泛，我们倡导政府政策这些，但是中国和欧洲共同有一些什么行动让这个事情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这个国情不一样。

Isabe Eiriz：协会有没有能力实施这个法律？

韩嘉玲：中午吃饭的时候再讨论吧。

周艾丽：下一个是价值挑战，如何能够保持既与现代性同步又不以我们自身的价值做交换？如何在向他者敞开胸襟的同时保存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在欧洲更加明显一点，在移民子女教育上，他们自身的文化跟当地的文化，他们如何

既融入当地的文化又保持自己的文化。

蔡晓芳：问一下，她们在这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既融入当地的文化又传承自己的文化。

Isabe Eiriz：这个Values具体是指的什么？

韩嘉玲：这个不是我定的，是这个大会定的。

翻译：欧洲的价值观自理，能够自己去解决问题，不要太依赖于别人，从一个方面是比较积极，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个人主义，还有一个要团结，对于总的来说，总的价值观。

蔡晓芳：这个是她个人的理解，还是她传递给这些移民的价值观。

翻译：这个价值观不仅是对移民，可能是全部的。

周艾丽：这边也讲到了，在我们中国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存在于，政府是以这种经济主导为导向的这样一个政策，其实在民间，大家的价值观其实也是这样，还是追求物质追求经济这样一个价值观，在中国人们对自我的认知，对社会的承担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缺失的。

韩嘉玲：我们的发展模式就是以经济导向为主的发展模式，个人的价值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人追求物质不像现在这样子以追求物质追求个人的向上，拜金这样的风潮，事实上这个蛮挑战我们传统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是跟她是一样的意思。

翻译：你刚刚说的现代中国人为金钱牟利没有责任这种，现在这种价值观，我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想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周艾丽：这个可能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不是在中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价值观，对欧洲来说对中国来说都是一样，不仅是追求金钱，追求物质，同时也是追求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尊重这样一个文化。

翻译：她们是希望她们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社会想要的价值观，平等、公正、和谐，她现在要说她们希望达到的一种价值观。

Isabe Eiriz：我们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的发展模式是追求金钱为导向的价值观，现在希望通过努力，通过政府的努力和人民的努力，注意这种正确价值观的宣传，就是像刚刚伊莎贝拉说的要团结、凝聚、责任感、自主。通过一个政府，通过法律，通过一些相关的协会、机构，给社会民众一种压力，

让他们真正有一种意识，现在这种价值观是不好的，让他们树立这样一种，刚才说的团结、自立、责任感、友爱、凝聚力这样一种价值观。

翻译：在欧洲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他们在各个协会各个国家他们形成一种网络，形成一种凝聚力，比如说她所工作的这个反贫困反歧视的协会，就是和其他的移民协会，或者关于经济方面的，他们都有一种紧密的联系，这样他们就可以形成一种合力，她觉得中国这一方面，需要做的就是形成这样一种协会网，大家相互沟通联合起来，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通过政策的导向，让民众有压力，形成一种价值观。

韩嘉玲：中国是有这样子NGO的网络，我们在写一个民工在城市的生存状况NGO的报告，就是在NGO的角度反映农民工在城市里面教育、居住、健康，他们种种的问题，我们是希望通过发出NGO的声音，希望达到对政策的影响。

翻译：NGO这样一个网络，是和移民进行沟通，还是和其他的任何一种主题的协会，或者是NGO组织密切合作呢？

韩嘉玲：中国现在NGO有不同领域的，环境、教育还有各个方面领域的，扶贫领域的也有，刚才只讲农民工，近期是有一个NGO报告有讲到教育的，农民工的领域虽然我们学生写的，我们写两份报告都是报告有关农民工贫困问题的反映，我们学生写的是NGO的，我是写给政府的报告，中国在很多层面都有不同的NGO，我这是教育方面的。

蔡晓芳：至少在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已经在做了。

韩嘉玲：“基盖音”网里面就有这样一个报告，里面是包括很多的网络，包括很多的NGO。

蔡晓芳：而且做这一项工作的，除了NGO组织政府也在做，中国的国情一直下到社区居委会，居委会也有一个网络，与政府联系。

周艾丽：我觉得价值观的培育，最重要的应该是农民工对于孩子最重要的责任主体在学校老师身上。

韩嘉玲：也不完全，社会也可以做，老师的价值蛮受到社会的影响，这是关联的，老师为什么会势利眼，因为社会都势利眼，大家都穿名牌你不穿名牌，你能抵得住这个的压力吗，我觉得从政府的模式，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还有传统的，传统的价值当然不说了，现在的价值是在不断的侵蚀和

挑战传统的价值。

蔡晓芳：如果是农民工这个层面，我觉得父母给他们影响更大一些。

韩嘉玲：中国的价值可能不是不同文化，可能是城乡之间的价值观不同，我们总体而言，城市是现代的话，农村是落后的话，中国是不发达的，西方是发达的，西方的价值观也特别挑战我们的价值观，哪一个是好的，真的很难说，西方的价值观也挑战中国的价值观。周立波说我可以接受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但我不能接受我女儿嫁给一个中国人贫困的农民，这就是他的价值观，我不能说好与不好，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子。

蔡晓芳：城市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跟农村里面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不是很高的父母，教的就是不一样。我的孩子我就问他今天快乐吗，农村的父母就说，今天听话不听话，农民工给孩子传递的就是你要好好干，挣多少多少钱，你要从这个贫民窟搬的隔壁的小区里，农民工的教育就是让他们朝着那个领域走，我们不是，我们是教孩子更快乐，让他有一个责任感，自然而然就区别开了。

方原：我认为农民工自己本身的价值观也很重要，这个价值观也很重要，你刚才说城市里的人的观念和农民工教育孩子的观念，差别是很大的，但是这两种差别都是两种价值，如果这两种价值观不一致的话，作为相互的融合难度是比较大的。

韩嘉玲：这里有一个问题，你说要改变，就变成我们觉得他的价值观是比较落后的，我们的价值观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希望他改变。

方原：我不认为他一个落后一个进步，只是说不同地域的环境和文化造成了他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认为只要是一种积极的健康的一种心态，就是对的。

韩嘉玲：如果是积极的话，他让他的子女好好念书，好好学习，积极向上，以后要搬出贫民窟进入城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价值观，我觉得刚才小芳说的价值观，我们环境好的人，已经脱离了基本生存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快乐，我妹妹的孩子是全班最后一名，她跟我说，没关系啊。我们家又不指望他挣钱，我说你只要不吸毒就好，你说我们的价值观差别多大，我觉得有不同的程度，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价值观是很复杂的。

蔡晓芳：价值观形成也不是一天就形成的，是从成长的环境，父母的影响。

翻译：刚刚说小孩的价值观，可不可以理解成，刚才说通过家长，在学校乖

不乖，可不可以换一种思维，看他是不是尊重别人，尊重老人尊重学生。还有一个，在物质上面，支持家庭，她的理解是这样，对家庭支持和担当。另外一个尊重其他人，对于家庭的担当，还有尊重老人，这个应该是中国的传统。

蔡晓芳：这个只是一个现象，不是一个趋势。

Isabe Eiriz：尊敬老人、家庭的担当，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吗？传统的价值观怎么样保持这个传统，比如说像移民儿童刚来之后，我们是要保持传统，怎么样才可以一方面保持传统，同时当其他孩子都是这样做的时候，要他这样坚持吗。

举了一个例子，在瑞士也有这种移民家庭的孩子，他们家长的家庭教育，就是晚上不能出去，不能去上体操课，不能去酒吧，是一个非常尊重他们自己本国的传统去教育，孩子们还是希望和他们的同伴们，保持他们步调一致，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冲突之下，很多孩子最后都自杀了，这是她的工作，因为她是心理学家，这是她工作很重要的一个范畴。

周艾丽：我们刚刚谈到的在移民子女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们城乡之间的差异，他们给子女带来的价值观的不一样，我想知道在欧洲是不是也是这样，可能很多问题也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相对来讲是在一个一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在欧洲情况更加复杂，他们首先经济基础不是特别好，其次并不是说他们的价值观绝对的落后或者是文化的落后，他们是在另外一个文化当中出来的，他们代表了更多的文化差异，我不知道在欧洲对于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些很好的经验？

翻译：刚才说到文化的差异没有欧洲那么大，中国也是有少数民族，这么多民族共存，语言是不是都一样呢？我说不太一样，但是起码所有中国人都会说汉语，我们在报纸、电视媒体都是用标准的中文，每一个地方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多元性不像欧洲这么大，我们至少都会说中文，她说广东呢？我说虽然他们说的是粤语，广东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省，大多数还是说汉语的。

蔡晓芳：她其实是想说外语跟粤语怎么沟通，他也讲汉语，我们的差异还是不像国外那么大。

黄黑妮：学校幼儿园开始就说普通话了。

翻译：虽然刚刚说的是在中国内部人口的流动，可能会有其他国家的人来到中国，移动到中国也是这样，有很多。相对来说这种人口流动主要是在中国内部

的。

黄黑妮：有一个地方我知道，在广州有一个村，有很多非洲人，大极了，就像是在意大利一个唐人街一样，这一次我们要去看，听说很有意思，我去看，所有本国的人都在那里生活，也有小饭馆，买卖交易非常集中的，在广州，已经是很出名了，因为它出名我们要去看一下，因为我们那边也有，因为非洲那边非常开放信息很流通，他们听说那边有黑人，他们就去，我们还是从他们口中听说的，因为在意大利我们这些社团是连在一起的，他们会主动过来跟中国人说，你怎么不说话，你怎么不过来看我们跳舞，我们听说中国有机会，我有一个亲戚在广州怎么怎么，我们看了照片，我们就想去看看。

韩嘉玲：我去过那条街，我知道有一两条街完全卖非洲商品，因此在那附近有很多人在那边生活，有很多餐厅，有两条街，进到那里面所有的商品卖的是非洲的商品，最主要是衣服，主要就是中国所谓的小商品，有很多人去那儿买东西，形成了一个，他们叫做黑人社区，不一定是坦桑尼亚，说非洲人就行了。

翻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的非洲社区有没有他们的一些协会？

黄黑妮：我是从意大利他们那个协会知道的，但是那边是不是有，我猜有，因为非洲信息很流通。

韩嘉玲：闹过一次，有几千人上街示威。好像是签证的问题，他们常常就误期办签证，好像后来去办，就不给他们办，跟中国的警方有冲突。

翻译：想问一下，她之前觉得可能语言的问题应该是农村孩子到城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我们给她讲，大家都是用普通话，语言不是很大的问题，她就问，即使语言不是很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会构成很大的障碍呢？

韩嘉玲：有一个语言问题，就是英语跟不上，因为他们在农村上英语课比较晚，北京上英语课比较早，北京小学一年级就上了，农村上得晚，也没有那个氛围，一个是他们课程衔接的问题，中国不同的省份有自己不同地方的课本，基本上也是一样，可是小学生还小，这一段学了，另外一段没有教过来，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方老师补充。

方原：说得很对，中国毕竟是面积很大，是地方的风俗习惯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基本上到城市来都开始说普通话了，农村以方言为主，农村在课堂上都很少讲普通话，老师都不讲普通话，来到北京，来到城市来以后必须讲普通话。

韩嘉玲：就是有腔调的问题，语言在我们中国来说是不是有问题呢，我觉得不是有问题，就是腔调的问题，发音不标准。

方原：对于小孩子来说，刚进城市还真是一个问题，因为进城市里面都是说普通话，小孩子听普通话没有问题，到城市里听没有问题，同学和老师听他的话就费劲了，别人听他的话很困难。

韩嘉玲：那很快呀。

方原：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就可以了，韩老师说了课程的差别，因为我们国家课程是教科书是种类比较多，你比如说北京，北京版本教材比较多，农村是用地方的教材跟城市衔接不太好，教材的衔接不太好。

韩嘉玲：外国人不好理解，人家是应试教育，我们是考试教育。

蔡晓芳：外国的教材是同步的吗？

韩嘉玲：不是，人家因为不是应试教育，人家是创造性的课堂。

方原：语言不是问题，孩子刚进城市，头两个礼拜，重要的问题就是引导他说普通话，必须规范他普通话，如果规范不了，他在整个班里的融合很困难，他自己心里面压力很大。

韩嘉玲：每个年级都有是吗？

方原：每个年级都有，所以我们一般孩子进入学校头两个礼拜，主要的问题就是解决他说普通话。

韩嘉玲：不是一个很大语言差异的问题，我们是口音的问题。

方原：普通话说起来大家都没有差异，方言差别很大，我们要听很多地方的方言就像我们听外语一样的，你一点也听不懂，他要完全说方言你一点听不懂。

周艾丽：一般来说他还是会说普通话的。

韩嘉玲：我们温州人讲话是最听不懂的了。

方原：有一点，农村来的小孩子一般说不了普通话，小孩子说普通话，说不了。比如说四川、浙江，尤其是南方的省市，到北京来，小孩子很少讲普通话，但是他可以听懂普通话，他不会讲。

韩嘉玲：看电视都会听。

方原：没有讲普通话的习惯。

韩嘉玲：不是大问题，两个礼拜就可以纠正过来了。

周艾丽：我们对第二个问题差不多了。治理挑战，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说，如何能动员社会的力量，包括移民子女本身去参与到这个问题的解决中来，我觉得刚刚伊莎贝拉问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协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工作是什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韩嘉玲：比如说像我们中心，移民参与，怎么样让他们参与到这个里面，以及他们的声音作出的决策或者他们进入决策层面是这个意思。

周艾丽：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你刚刚说让移民自己参与到对他自身问题的解决，还有各个的主体包括NGO、媒体、政府各个方面他们如何形成合力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分成这两个。

方原：移民形成一个自治委员会，用委员会的形式。

韩嘉玲：应该是说那些人他们形成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声音，那是他个人参与，个人力量是不够的，怎么形成他们自己的组织。

周艾丽：我觉得也还不够，这里面强调的是全面整合，让移民自己参与也是一个方面，各自问题的解决，要他们参与，靠他们自己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力量。

翻译：她觉得我们讨论把她们给抛弃了，她的意见是，你们讲一讲，停下来，让我翻译，应该要有一个主持，一个问题翻译一下，你们在说的时候，他们不懂，就不行，我在听他们讲的时候，就没有听到你讲。

周艾丽：你给她们翻译吧。

方原：12点了。

翻译：她说不想边吃饭的时候，边讨论。

韩嘉玲：你问她怎么办。

翻译：她们刚刚说，工作就是工作，吃饭就是吃饭，不想把二者混了。她们还在讨论，怎么样找到一个解决之道，时间不够了。

周艾丽：我们再花半个小时，把问题讨论完，她们也同意了。

翻译：她今天感觉很累，现在不想延长时间了，回去休息一下，下午的时候还要继续工作，要去参观学校，我们现在就想回去休息了。她的意思，我们现在马上就结束了，就不要再把这个工作再拖了。

周艾丽：没有别的时间再讨论了。

翻译：我就去休息了，你们其他的人再讨论，有什么意见？

韩嘉玲：我们基本上讲完了，中方的意见已经表达完了，就是看欧方的了。

翻译：因为他们自身通过建立这种协会，自己积极主动去参与，社会、政府也要动员起来，比如说出台一些政策鼓励移民去参与到这个政府的决策当中和一些过程当中。关于在这个领域从业的职业人士，他们不一定是移民，专业人士他们也应该动员起来，去倾听这些移民的需要，去倾听他们的愿望，伊莎贝拉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化，不仅是职业人士，里面的专业从业人员，还有大众，也需要共同的动员起来去帮助这些移民，或者是鼓励移民更多参与到这个当中。

周艾丽：第三个问题我们基本上达成一致了，第四个问题角色挑战，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中国和欧洲在全球治理中如何担当各自的责任？我觉得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加强对话。

翻译：刚才说要加强交往，从今天这个论坛就可以看到，大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交往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障碍冲突，这个是很难很难的。其实今天提供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背景共聚一堂，去讨论。所以我们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一个特别官方，特别表面的层面上，而应该要通过我们的不同，我们的多样性，真正探讨特别难的一些问题，去达成一个有可能的解决之道。

周艾丽：我们之间了解太少，不论是欧洲对中国，还是中国对欧洲，我们今天和昨天讨论的都是中国和欧洲特别常识的一些问题，我们之前多看一些文章和文献就知道这些问题了，还是之前的了解太少了，如果以后可以再有这样的机会，大家事前做好充分的功课，对对方有足够的了解才会有一些实质性的结果出来，要不然不可能。

翻译：除了这一方面，你刚才说之前做功课要充分了解，还要了解文化的差异，欧洲人和中国人在交流过程当中，他们交流的文化一定要有。

黄黑妮：这一次开会就看得出来，欧洲跟我们的差异，因为现在欧洲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效率很高，这几十年我们往前走，不光体现在经济商业上，也体现其他方面，包括学术，因为这个安排就是一天半都要做好，看得出来差异，这种这么紧凑的，欧洲是不适应的，这是特别明显。

这样的话，当然就坏了，事实是这样，那边就是不适应，说老实话，这是一个差异。要知道，以后大家怎么有一个好的方法，还有他们不怕争，争完了不会生气，不用紧张，他们就是这样，一会儿就没事了，就事论事。为什么那么慢，昨天我说过，他们全要理清楚，大家都要知道，这样你们才能了解我，我什么都没说，来了这么多专家，按照这个走一遍，这些专家突然消失了，多可气啊，我们想了解多一些，每个人都有丰富的背景文化，怎么一天就没有机会了，她们觉得我们那么远过来一次，结果就是这一天，这是昨天晚上她们说的，我也想讲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老讲小事，不断的在重复小事上讲，为什么？原因是她觉得人是一个特别重要，甚至她讲移民，她抱怨移民到了一个地方没有地方住，连宠物都没有办法养，底下人觉得好笑，她的关爱是到个体，很强调这个，人性的东西缺少，她并不理解，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快，非常有效率，我们工作是很有效率，并不等于我们没有考虑这些问题，这个都要有了解，我就说一下。

翻译：昨天我们也讨论过关于精神上的需求，关爱的需求，爱的需求，这也是他们心理学家非常关注的一个。